

地理符號學視角下日韓留學生語言文化教學*

李麗

(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副教授)

摘要：作為與中國有著密切地緣關聯的日韓留學生，一直以來都是漢語學習的重要群體，他們對漢語文化具有充分的認知和理解，可以更好地推動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流、增進東亞人民之間的友誼。從地理符號學的研究視角觀照東亞，尤其是日韓留學生的漢語文化教學，可以豐富對外漢語文化教學手段、更加熟悉並親近中國地理語言文化環境、促進儒學文化圈的交流互通、增加社會語言文化實踐內容、開發多媒體教學資源、推動語言景觀分析的深入發展。

關鍵詞：地理符號學、日韓留學生、語言文化教學

* 收稿日期：2024 年 09 月 21 日；通過日期：2024 年 11 月 05 日。

A Geosemiotics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and Culture Teaching for Japanese and Kore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i, Li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Japanese and Kore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their close geographical ties to China, have long been an important group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Their comprehensive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can better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enhancing friendship among the people of East Asia. Viewing East Asia, especially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ulture for Japanese and Kore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semiotics can enrich the mean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oster familiarity with China's geographical and linguistic-cultural environment, promote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within the Confucian cultural sphere, increase the content of social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practice,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media teaching resources, and further advance the analysis of linguistic landscapes.

Keywords: Geosemiotics; Japanese and Kore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anguage and Culture Teaching

一、引言

地理符號學 (Geosemiotics)¹ 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它結合了地理學、語言學、符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專注於研究空間中的語言和符號系統，關注這些語言和符號如何在特定的地理和社會空間中被賦予意義，以及它們如何影響人們對空間的感知和理解，為研究公共空間中的語言和符號提供更加豐富的分析框架。由於地理符號學認為空間不僅僅是物理存在，也是充滿意義的社會和文化建構，其研究範圍比較廣泛，包括了公共空間中的語言使用，如街道名稱、看板、店鋪名、路標、站牌等；非語言符號系統，如圖像、標誌、顏色、形狀等；空間與意義的互動，如探討符號怎樣與特定的地理和社會文化相結合。

地理符號學的研究成果包括了對公共空間語言和符號使用的分析，對權力、地位及文化身份的探討，² 對空間意義的社會建構的理解等。³ 這些研究不僅增進了我們對社會和文化現象的理解，還為城市規劃、語言政策、文化交流等領域提供了理論和實踐的指導。⁴

從地理符號學視角來考察東亞尤其是日韓留學生的語言文化教學，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亞洲雖說廣袤分散，但東亞卻相鄰緊湊，中、日、韓自古以來就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有著相近的地理風貌和人文景觀。當然，地理意義上的東亞，除了這三國外，還包含朝鮮與蒙古，也有人認為越南曾內在於儒學文化圈，因此也屬於廣義上的文化東亞。但是「中日韓」卻有著更加密切的聯盟紐帶，所謂「東盟與中日韓 (10+3)」合作框架，便是這三國無論在地理、文化、還是經濟等方面區域共同體

¹ 地理符號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其歷史並不算長。1997 年 Rodrigue Landry & Richard Y. Bourhis 在學術論文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中首次提出了「語言景觀」(Linguistic Landscape) 的概念，強調公共路牌、看板、街道名、地名、商鋪招牌以及建築物公共標牌上的語言，在形成某個地區或城市群的語言景觀中的作用。2003 年 Ron Scollon & Suzie Wong Scollon 在專著 *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 中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研究，並提出「地理符號學」(Geosemiotics) 概念。

² 尚國文、趙守輝，〈語言景觀研究的視角、理論與方法〉，《外語教學與研究》，第 2 期 (北京：2014)。

³ 葛俊麗，〈語言與空間：語言景觀研究視角〉，《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第 38 卷第 4 期 (北京：2016)。

⁴ Gorter, Durk, "Linguistic Landscape: A New Approach to Multilingualism." *Tijdschrift Voor Nederlandse Taal-en Letterkund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6).

的邏輯體現。另外，從外國來華留學生的生源地來看，日韓學生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學習群體。拿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來說，這些留學生無論在數量還是漢語水準上，都保持著相當優勢。因此，以地理符號學的相關理論為指導，考察如何更加有效地進行東亞留學生，尤其是日韓留學生的語言文化教學，是非常重要的和有價值的。本文擬從以下幾方面展開論述，分析地理符號學在日韓留學生語言文化教學上的具體實施和運用。

一、親近中國地理語言文化環境

地理符號學認為，空間是文化的載體，通過對空間符號的解讀，可以深入瞭解一個地區的文化內涵。⁵ 在對外漢語文化教學中，可以充分利用該理論，將空間符號視為教學手段，在教學內容和素材的選擇上，有傾向性地引導學生對自然景觀、建築、道路、地名等符號進行闡釋和解讀，以更好地瞭解中國文化的歷史背景、地域特色和民俗風情。對日韓留學生來說，他們的國家有著與中國大致相近的語言文化環境，在地理符號學視角的觀照下，這些學生在學習中，大多能更好地熟悉並親近中國的語言文化環境，從而提高漢語水準和跨文化交際能力。

自然景觀作為一種空間符號，承載著豐富的文化意義。中國的名山大川、湖泊河流等自然景觀，往往蘊含著歷史典故、詩詞歌賦、文學藝術等文化內涵。中國山水畫便是對自然景觀的一種藝術表達，其中蘊含了中國古代文人的審美情趣和哲學思想。雖說中日韓三國都有線條簡約、色彩淡雅及構圖別致的山水畫，但不同於中國山水畫的強調「意境」，日本山水畫則注重「寫實」，韓國山水畫也在自然、和諧、簡約的審美觀念中融入了本土特色。因此，在教學內容設置上，可以添加鑒賞像唐朝詩人王維一些著名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創作，引導學生更加深入瞭解中國人對自然的態度和觀念。還可以具體地將中國的山水畫與日本的浮世繪、韓國的宮廷畫等，進行對比鑒賞，並讓日韓留學生用漢語描述這些藝術作品中各自的地理文化特色。

⁵ Shohamy, Elana and Shoshi Waksman, "Linguistic Landscape as an Ecological Arena: Modalities, Meanings, Negotiations, Education." In Elana Shohamy and Durk Gorter (eds.),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建築是文化的物質載體，不同地區的建築風格和特點反映了當地的歷史、文化和民俗。中國的傳統建築，如宮殿、廟宇、園林等，往往運用了豐富的符號語言，如屋頂的形狀、門扉的裝飾、庭院的佈局等，都蘊含著特定的文化意義。中日韓三國的傳統建築在結構、材料和某些設計理念上有相似之處，但在裝飾、佈局和細節處理上各有特色，這反映了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審美觀念。在教學中通過解讀這些建築符號，日韓留學生可以在對比中更好地瞭解中國建築獨特的審美觀和價值觀。

曾有論者指出，地名用字基本上都是規範漢字和通用漢字，城市地名用字的組合有規律，構詞能力強，形義聯繫透明。因此在教學實踐中，把當地地名用字納入教學框架內，效果突出。⁶ 地名是人們對空間的認知和命名的結果，蘊涵著當地的自然和人文資訊，它不僅是一個地理位置的標識，更是文化傳承和歷史記憶的符號。在中國，許多地名都與歷史事件、人物活動、地理特徵等密切相關，如長城、黃河、泰山等，這些地名背後都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通過闡釋此類地名中的文化符號，日韓學生可以具體瞭解到中國一些相關的地名由來及歷史淵源。

在地理符號學視角下，還可以更好地說明留學生讀解社會語言中的文化內容。社會語言是人們在日常交流中使用的語言體系，它反映了社會的價值觀、習俗和思維方式。中國的社會語言，如成語、諺語、俗語等，往往蘊含著豐富的地理文化內涵。通過地理符號學視角解讀諸如「一衣帶水」「江山如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不轉水轉」「不到黃河心不死」「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等中的文化符號，可以說明留學生更好地理解中國人的生活智慧和審美情趣。

鑒於以上，教師在對外漢語教學內容設置方面，中要學會有意識地在地理符號學理論的指導下，充分利用地理空間，如自然景觀、各類建築、地理名稱等符號文化輔助課堂教學，對於日韓等地緣接近國家留學生的教學，更應如此。

二、促進儒學文化圈的交流互通

⁶ 全彩宜，〈漢語國際教育視域下的城市地名用字研究〉，《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2018）。

在地理符號學概念中，文化具有地域性特徵，不同地區的文化在符號表達上存在差異。儒學文化圈通常指歷史上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的地區，主要包括中國、日本、朝鮮（韓國）、越南等東亞國家。這些地區在文化內容、社會結構、價值觀念等方面有著共同的特徵，如重視教育和家庭觀念，強調社會和諧，尊重長者和權威等。儒學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與地理環境密切相關，其某種意義上就是基於地緣關係的一種概念表述。

從語言文化層面看，體現儒家核心思想的漢語詞彙有仁愛、禮義、孝道、中庸、忠誠等，也包括諸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百善孝為先」「家和萬事興」「禮多人不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這些詞彙、詩句和俗語都是儒學思想的體現，它們在漢語中廣泛流傳，影響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而在日韓等國，同樣有忠、孝、禮儀、和為貴等倫理道德及價值觀念。從地理符號學角度進行闡釋，能幫助日韓留學生多方位理解這些詞句背後的文化淵源。

舉個例子，儒家思想強調「天人合一」、「仁愛」、「禮節」等價值觀，這些觀念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支柱，也是農耕文明悠久發達的表現。農耕文明高度依賴於自然地理環境，如氣候、土地、水源等，這就促使人們思考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天人合一」便是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強調農民在耕作過程中尊重自然規律，遵循時令節氣，維護土地的肥沃和生態環境的平衡。同時，農耕文明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耕作土地，人口的增長和家庭的穩定便成為重心。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生產方式，促進了家族制度和宗法制度的發展，儒家思想所宣導的「孝道」「仁愛」等價值觀，便是與農耕文明中的家庭觀念和社會結構相契合的表達。此外，在農耕社會中，土地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成為社會等級和階級分化的關鍵因素，擁有土地的貴族和地主形成了社會的上層階級，而耕種土地的農民則成為下層階級。這種階級分化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並影響了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儒家思想中的「仁政」和「禮制」等理念，便順應農耕文明中的社會等級和階級分化而生。中國的農耕文明還影響了文化傳統和節日的形成。比如農曆新年恰好農閒，而中秋佳節正值收穫，這些都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反映了人們對自然節律的尊重和對農業生產的重視。

農耕文明也在日韓等國的發展歷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社會結構、經

濟體系和文化傳統方面，因此日韓也有與中國相類的傳統節日，如慶祝農曆新年、清明祭祀先祖、中秋團聚賞月等。不過，有些節日在慶祝的具體日期、習俗及慶祝方式上會有差別。例如，中國南方水鄉在端午節會舉行盛大的龍舟比賽，這與南方豐富的水系資源密切相關。而在日本和韓國，由於地理環境的差異，端午節的慶祝活動則有所不同，日本的端午節更注重裝飾和兒童的健康成長，而韓國的端午節則與農業祭祀活動相結合。而節日食品的選擇，也往往與當地的地理資源和農業生產密切相關。通過地理符號學視角的闡述和解釋，日韓留學生可以在共情的基礎上，更加自然順暢地瞭解並接受中國傳統習俗和文化。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中國的飲食文化也與農耕文明緊密相關。中國人主食大多以米飯和麵食為主，這些主食的生產與地理環境密切相關。日韓留學生大多也同樣喜食米飯，同樣對拉麵或冷面情有獨鍾。有些歐美人會用 **rice eater** 這個詞彙來調侃亞洲人，面對這樣的言論，重要的是提高對不同文化的認識和尊重，促進跨文化的理解和包容。每個人都有權為自己的文化和習俗感到自豪，同時也應該尊重他人的文化和習俗。嘲笑或貶低他人的飲食習慣是不恰當的，也是不必要的。儒家文化中「和而不同」「相容並包」等思想觀念，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愛吃稻米的飲食習慣是地域、歷史和文化的自然產物，不應該是被嘲笑或歧視的理由，而是與東亞尤其是日韓等國留學生拉近彼此距離的好辦法。在對外漢語文化教學中，可以組織豐富的美食品嘗或烹飪分享，讓學生在共同的飲食愛好中激發興趣，增進友誼。

由此來看，既然儒家思想通過地理空間的傳播，影響了中國乃至東亞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在對外漢語教學尤其是針對日韓等文化圈內留學生的教學中，我們要學會在地理符號學的指導下，積極利用地緣優勢，促進文化的交流與互通。

三、增加語言文化實踐內容

中國有句名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常被用來表達學習和實踐經驗的重要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學習和旅行都被視為個人成長和修養的重要途徑。習近平總書記在 2021 年 6 月 21 日給北京大學留學生的回信中也說：「百聞不如一見。歡迎你們多到中國各地走走看看，更加深入地瞭解真實的中國。」眾所周知，語言環境在二

語/外語學習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語言學習離不開環境的影響，需要高度情境化社會背景的配合。⁷ 無論是什麼形式的語言學習，都要設法營造有利的語言環境，應該「建立課上課下、校內校外、學習與習得相結合的新教學體系」，⁸ 這正好契合了地理符號學對空間環境的認知理解。

學習場域中的語言環境對語言學習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疫情期間，我們發現很多學生抱怨不能去教室上課；有的甚至明確表示，如果一直不能來到中國的校園，他們就會放棄繼續學習漢語。留學生離開母國，奔赴海外求學的主要動因之一，便是想要身臨其境，便是看重學習環境的影響，便是明白地理因素的重要性。鑒於此，在對外漢語教學課堂實踐中，為學生創造一個高效而生動的語言文化學習環境，是非常關鍵的。課堂之外，可以組織一些「地理符號文化沙龍」活動，讓日韓留學生與中國學生一起參與，通過演講、表演等形式介紹自己國家的地理符號文化，比如日本學生可以介紹坐落於奈良，昭示著中日深厚佛教淵源的唐招提寺；可以設計角色扮演，模擬文人遊歷名山大川的經歷，或模擬唐朝時期的遣唐使，讓學生在角色扮演中學習地理符號和歷史文化；也可以組織學生參與諸如漢語角、文化節交流活動，以增進相互理解；還可以讓學生通過攝影、繪畫或寫作等，來表達他們對校園或居住環境的感受。學校之外，充分利用與中國友好家庭、社會場所以及其他相關外部社會文化環境的互動交流，來輔助留學生的語言文化學習，也是非常有效的實踐方式。

有論者表示，「自然習得對有意識語言學習的不足有較大的彌補作用，輕視課外環境無疑是對豐富的語言環境資源的巨大浪費。」⁹ 日本和韓國作為中國的近鄰，其自然景觀也受到了相似的地理和氣候條件的影響，在山脈、河流、湖泊、森林及海岸線等很多方面，與中國有相近之處。因此，可以有選擇性地組織日韓學生參觀中國的名山大川、湖泊河流等自然景觀，讓他們親身體驗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國自然之美；也可以組織他們參觀中國的古建築群、民俗村落、歷史文化名城等，親身體驗中國建築的獨特魅力，並通過解讀建築景觀中符號文化的異同，瞭解其背後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故事。此外，還可以帶日韓留學生遊覽與其母國文化關聯密切的城市

⁷ 尚國文，〈語言景觀與語言教學：從資源到工具〉，《語言戰略研究》第2期（2017）。

⁸ 劉珣，《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0），233。

⁹ 張崇富，《語言環境與第二語言獲得》，（四川大學出版社，1999）。

或社區，比如位於上海閔行區虹橋鎮的韓國街，那裡是一個充滿韓國風情的地方；北京西城區韓國臨時政府舊址，那裡是韓國獨立運動在中國的重要歷史見證；還有中日友好園林、中韓友誼雕塑，日本和韓國人居住較為集中的城市街區、廣場等等，都值得讓日韓留學生去參觀體驗。

因此，在對外漢語教學中，首先要充分利用好課堂環境，為學生創造一個真實生動的語言文化學習氛圍。課堂之外，再多組織一些「地理符號文化沙龍」活動，通過演講、表演、交流等形式，實現社會文化環境的積極互動。此外，還要讓日韓留學生親身體驗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國自然之美，遊覽與其母國文化關聯密切的城市或社區，在交流互鑒中既能提升漢語文化水準，又能拉近彼此的情感距離。

四、豐富語言文化教學資源

對於無法實現實地考察探訪的地方，尤其是想要進行同步對比體驗的，利用虛擬實境（VR）等技術來類比遊覽過程，創建視覺、聽覺、觸覺等多感官沉浸式旅遊體驗，是生動且高效的。教師可以此讓留學生獲得類似身臨其境的文化考察感受，從而提高語言學習興趣。拿日韓留學生來說，可以通過數位虛擬實境還原諸如中國的故宮、日本的京都禦所、首爾的景福宮這三個東亞文化中有代表性的宮殿，帶領學生一起討論分析它們的建築風格、歷史意義和文化象徵，學生在探討和交流中，不僅能瞭解這些宮殿在各自國家歷史中的角色，還能提升相關的漢語表達水準；也可以利用現代流行文化的地理符號，將諸如中國的網紅打卡地與日本的動漫聖地、韓國的首爾塔等地標進行對比體驗，引導學生學習如何用漢語討論這些地理文化現象；還可以深入探討中日韓三國自然景觀的異同，例如通過比較中國的泰山、日本的富士山和韓國的漢拿山，分析這些山峰在各自文化中的象徵表達。

隨著虛擬科技的發展，人們對社會空間的認識逐漸由「現實世界」轉變為「虛擬世界」，語言景觀研究內容也開始與時俱進，變得更加廣泛，這些都為未來語言景觀的研究方向開闢了新的思路。¹⁰ 利用社交媒體平臺，如微博、微信、抖音等，創

¹⁰ 付文莉、白麗梅，〈國內語言景觀研究的 Cite Space 分析（2005～2019）〉，《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第 3 期（2020）。

建專門的對外漢語教學帳號，製作並定期發佈有助於留學生學習的中國語言文化內容，也是豐富教學資源的重要途徑。比如用短視頻介紹中國的「五行」與地方特色的關係；用圖文並茂的方式講解中國各地傳統節日的地理標誌；還可以用動畫、漫畫、短視頻、紀錄片、微電影等形式，製作一系列有特色的地理文化故事，如徐福東渡、鑑真東渡、唐朝與新羅、宋朝與高麗等。對於日韓留學生來說，先以他們熟悉的地理文化元素為引子，再逐漸過渡到中國語言文化的學習，會使學習的內容更加親切和易於接受。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利用虛擬實境技術和社交媒體進行教學時，要避免教學內容的呈現過於簡單化、表層化和娛樂化，也要避免可能造成的某些文化刻板印象。這就要求教師謹慎設計教學材料，確保準確、全面地反映文化的複雜性和豐富性。還有，在虛擬教學的實際操作中，教師需要考慮如何有效促進學生之間、師生之間的良性互動。對於日韓留學生來說，利用他們熟悉的地理文化元素切入教學是一種策略，但若只停留在表面，不對深層文化內涵予以關注，將會影響他們對漢語學習的真正興趣和理解。

地理符號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它與歷史、文學、藝術等多個學科領域密切相關，想要開發並豐富語言文化教學資源，還需要打破學科壁壘，整合跨學科資源。對於日韓留學生來說，由於跟中國更加親密的地緣關係，他們一般對中國歷史文化、文學藝術知識的熟悉程度相對較高，在漢語教學過程中，完全可以利用日韓留學生的這一優勢，在地理符號學視角下，設計與中國歷史事件、文學作品、影視藝術等相關的教學資源。比如筆者在教授留學生「樂不思蜀」等成語時，曾有好幾位韓國留學生表示從小就聽說過「三國」的故事，並且很感興趣，很多日本學生也表示熟知三國那段歷史。教師便可順勢結合地圖、動畫、紀錄片等多模態資料裡的歷史地理知識，選擇性地介紹三國鼎立時期發生的著名歷史事件、相關典故、成語俗語，還可結合影視劇作品，還原三國時期的草船借箭、赤壁之戰等著名戰役，展示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與特定地理符號的關係，讓學生不僅能理解、會運用相關字詞句，也對中國的山川地理、風土人情和歷史典故都能有所掌握。

中日韓三國文藝作品裡都不乏對地理符號的渲染描繪，因此要善於發現並挖掘其中寶貴的教學資源。例如通過對比分析的方法評鑒中國的《紅樓夢》、日本的《源氏物語》和韓國的《洪吉童傳》。《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是中國古典園林的典型代表，

體現了中國園林藝術的美學追求和造園技巧；《源氏物語》中貴族生活莊園和宮殿，體現了平安時代日本貴族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觀念，這對日本後世的建築設計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洪吉童傳》裡對朝鮮時代宮廷貴族府邸、宗教及民間建築也多有描繪，由此能夠管窺朝鮮時代建築特點和審美趨勢。教師可以利用相關教學資源，引導學生用漢語描述作品中故事發生的環境背景，並通過對建築文化風格的描述歸納，體會各自民族的文化特徵。

總之，從地理符號學角度開發並豐富對外漢語語言文化教學資源，需要充分利用數位虛擬技術、各類社交媒體平臺，通過動畫、漫畫、短視頻、紀錄片、微電影等形式創新教學資源。還要善於跨學科整合歷史、文學、藝術等各類教學資源，教學環節注重實踐性與互動性。

五、推動語言景觀分析深入發展

「語言景觀」(Linguistic Landscape)一詞最早於 Landry & Bourhis 的論文《語言景觀與族群語言活力》(*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中提出，並被定義為：「出現在公共路牌、看板、街道名、地名、商鋪招牌以及政府樓宇的公共標牌之上的語言，共同構成某個屬地、地區或城市群的語言景觀」。¹¹ 在城市的公共空間中，語言以形形色色的標牌為載體，反映了當地的語言生態，也構成了社區的實體語言環境。語言景觀研究關注公共空間中語言的使用和展示，關注語言標牌如何把人們的生活空間轉化為蘊含語言意識形態的文本空間，又如何將某種資訊或象徵意義傳遞給讀者，同時對人們的思想或行為施加某種影響。語言景觀研究有助於我們理解多語言社會的語言使用情況、語言政策、身份認同以及區域文化特徵等。

2008 年，加拿大學者戈特和塞諾茲首次提出，語言景觀對二語學習者語言知識和使用產生影響，從而掀起了語言景觀在二語習得與語言教學中的研究熱點。¹² 近年來，語言景觀分析也走進了國內二語教學研究視野。尚國文指出，作為現實語言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語言景觀在語言教學與習得過程中常被視為一個有力的教育

¹¹ Landry, R. & R. Bourhis,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1997).

¹² 杜克·戈特著，方小兵譯，〈西方語言景觀研究學術簡史〉，《語言戰略研究》，第 4 期（2020）。

工具和重要的輸入來源。¹³ 張暉、張恆表示，語言景觀不僅可以作為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額外的輸入資源，還在促進語言學習者語用能力和多語能力的發展、培養多模態技能、提高語言意識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¹⁴ 張正生更是明確歸納了語言景觀標識適用於漢語教學的四個原因：標識是真實而不是編寫的教材、標識對在漢語環境中的生存至關重要、標識展示了典型的漢語書面語體和常用的修辭手段、為瞭解中國文化和社會提供了一扇視窗。¹⁵

目前將語言景觀理論與對外漢語教學相結合的研究，主要見於碩士學位論文。搜索中國知網博碩士論文庫可見，最早將語言景觀與國際中文教育相結合的研究出現在 2018 年，有兩篇學位論文。¹⁶ 此後每年都有圍繞該理論的相關碩士學位論文出現，且數量呈逐漸上升的趨勢。2023 年，知網共收錄約的相關學位論文有 5 篇之多。¹⁷ 這些論文大多聚焦於語言景觀的呈現方式，包括道路標牌、交通標牌、街道路名、店名鋪名、公園標牌、社區機構標牌、建築物標牌等公示語、告示語、標識語、宣傳語的字體、顏色、設計、內容、排列方式等的影響，所涉城市及國家包括合肥、西安、青島、濟南、大連、福州、鎮江、南京、北京、泰國等，其中以西安語言景觀為研究物件的學位論文數量最多。¹⁸ 其研究框架、思路及步驟大體可以歸納為：語言景觀理論概述、前人相關研究梳理、語言景觀資源收集整合、相關教學案例設計與實施、教學回饋與總結等。

中國很多城市語言景觀標牌中的語言構成有漢字、詞語、短語、句子；標牌中語言的句類主要是陳述句、祈使句和感歎句；標牌中語言的語體以書面語為主；語言標牌內容豐富，不僅是資訊的載體，也是文化的體現。將語言標牌作為教學資源

¹³ 尚國文，〈語言景觀與語言教學：從資源到工具〉，《語言戰略研究》，第 2 期（2017）。

¹⁴ 張暉、張恆，〈教育教學視域下的語言景觀研究述評：理論、議題及啟示〉，《創新》，第 4 期（2021）。

¹⁵ 張正生，〈漢語景觀與漢語教學〉，《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第 3 期（2024）。

¹⁶ 這兩篇論文分別是：孔悠靜《漢語國際教育背景下合肥市語言景觀研究》，（安徽大學，2018）；張瀚文，《語言景觀對國際學生漢語學習的影響研究》，（遼寧師範大學，2018）。

¹⁷ 這五篇論文分別是：冷招妹，《言語社區視域下語言景觀應用於國際中文漢字教學研究》，（魯東大學，2023）；陳禧寒，《校園語言景觀對來華留學生跨文化適應的影響研究》，（山東大學，2023）；雷丹妮，《漢語情景教學法中的語言景觀應用研究—以西安語言景觀為例》，（西安石油大學，2023）；何僑棠，《漢語語言景觀應用於對外漢語翻轉課堂的教學實踐研究—以泰國清邁甯曼路語言景觀為例》（2023）；葉婷婷《語言景觀在留學生漢語教學中的應用研究—以重慶市語言景觀為例》，（西南大，2023）。

¹⁸ 知網所收錄的從 2018 年到 2023 年，將語言景觀理論運用於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碩士學位論文約 26 篇。

在漢語教學中應用，能夠為課堂提供更多可能性和趣味性。拿日韓留學生來說，由於漢字在日本也常用於路牌、店名和招牌等，漢字是日本文化不可替代的組成部分；通過觀察韓國街景中的招牌、廣告、路牌、建築名、橫幅等也可發現，在當今韓國語言生活中，漢字仍舊具有較大比重的呈現，它並不僅僅存在於中國城之中，還滲透在韓國人日常生活之中。¹⁹ 鑒於日韓使用漢字的歷史，特定的地理語言符號可能會引起日韓留學生的興趣和親切感，尤其是一些在他們的文化中也有重要作用和意義的漢字景觀，如和、忍、禪、禮、孝、忠等；有很高知名度的歷史古跡或建築物名稱，如故宮、長城、秦始皇陵等；春節、中秋節、端午節這些節日的漢字名稱和相關的習俗，也會引起日韓學生的情感共鳴，因為他們也有慶祝這些節日的傳統，儘管形式和名稱略有不同；而韓式烤肉、壽司店、日本料理的店鋪名稱，一定會讓日韓學生有賓至如歸的感受。通過領略並學習這些具有文化內涵和歷史聯繫的地理符號，日韓留學生不僅能夠學習漢字，還能夠更深入地瞭解中國文化，並自覺與自己國家的文化進行對比和聯繫。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語言景觀研究多語社會中不同語言如何在公共空間中展現，以及這種展現如何反映語言權力和身份認同，但其研究本身也有一定局限性。舉個例子，在很多國家城市，雙語或多語的景觀招牌主要以當地官方語言或強勢語言英語為主。就拿有著複雜語言使用狀況的澳門來說，即便澳門有「三文四語兩字」²⁰ 之稱，其少數族群語言在澳門語言景觀中的表現也不很明顯。²¹ 據考察，澳門多語標識主要為中、英、葡。中日、中韓、中法、英韓、中英韓的比例都非常小，且使用這些語言的商鋪多是與這種語言所在的國家相關的餐廳或商店。²² 地理符號學的特點是，除了語言景觀外，它還關注符號系統如何構建和表達地理意義，並涉及地圖空間圖像、地名學及空間認知等方面，強調空間資訊的符號化和解讀，以及這些符號如何影響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和表達。因此，對於有著特殊地緣關係的日韓留學生，我們在漢語文化教學方面，不僅要充分利用好語言景觀教學資源，更不能忽略兩國與中國在地理文化空間中的其他密切聯繫。

¹⁹ 邊婷婷、晁亞若，〈韓國語言景觀中的漢字分佈及其意義表徵〉，《語言與文化研究》，第1期（2024）。

²⁰ 「三文」即中文、葡文、英文，「四語」即普通話、粵語、葡語、英語，「兩字」即繁體字、簡化字。

²¹ 趙學清、劉潔琳，〈澳門城市語言景觀的多模態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22）。

²² 張媛媛、張斌華，〈語言景觀中的澳門多語狀況〉，《語言文字應用》，第2期（2016）。

從研究內容及範圍方面看，語言景觀研究屬於地理符號學的一個分支。地理符號學借鑒了語言學中的符號學理論，將符號分為指示性符號、象徵性符號、圖示性符號等，該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語言符號的解讀能力。地理符號學的方法和理論應用於語言景觀的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地拓寬和深化我們對語言景觀的理解。在二語研究領域，借助地理符號學的視角，研究者可以探索語言如何在公共空間中被用作一種符號，來標誌特定的文化、社會或政治資訊。這樣的研究可以說明我們更好地理解語言如何在空間中被用來表達權力、認同和記憶，以及這些語言符號如何被不同的社會群體所感知和解讀。研究地理符號學可以使語言景觀研究不僅僅關注語言的表面現象，還可以深入到語言與空間、社會、文化之間關係的探討。通過這種跨學科的融合，我們可以獲得更豐富、更多維、更全面的理解，從而推動語言景觀研究的不斷發展。

六、結語

本文對地理符號學理論在日韓留學生語言文化教學中的應用進行了較為廣泛的探討，旨在對東亞尤其是日韓留學生的語言文化教學效能有所裨益。作為與中國有著緊密地緣關係的日韓留學生教學，在地理符號學理論指導下，教師可以幫助這些學生更好地熟悉並親近中國的語言文化環境，促進儒學文化圈更多的交流互通，增效社會語言文化的實踐內容，開發更多有針對性的多媒體教學資源，並且推動語言景觀分析的深入發展。

不過在引入新的理論和教法時，如何有效評估學生的學習效果和文化理解也是一個重要環節。教師還需要設計合理的評價體系，及時檢驗新的教學理念和方法的有效性，並根據學生的反饋適時調整教學策略。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此外，雖然地理因素對文化的影響很大，但日韓與中國在地理環境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即便是日韓本國的地理文化環境，也有著諸多不同。因此，針對不同地理文化背景の日韓留學生，如何更進一步地進行差異化教學，也是值得繼續思考和補充的。

徵引書目

- [1] 尚國文、趙守輝，〈語言景觀研究的視角、理論與方法〉，《外語教學與研究》，第2期（北京：2014）。
- [2] 葛俊麗，〈語言與空間：語言景觀研究視角〉，《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第38卷第4期（北京：2016）。
- [3] Gorter, Durk, “Linguistic Landscape: A New Approach to Multilingualism.” *Tijdschrift Voor Nederlandse Taal-en Letterkund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6).
- [4] Shohamy, Elana and Shoshi Waksman, “Linguistic Landscape as an Ecological Arena: Modalities, Meanings, Negotiations, Education.” In Elana Shohamy and Durk Gorter (eds.),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5] 全彩宜，〈漢語國際教育視域下的城市地名用字研究〉，《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2018）。
- [6] 尚國文，〈語言景觀與語言教學：從資源到工具〉，《語言戰略研究》第2期（2017）。
- [7] 劉珣，《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0，233。
- [8] 張崇富，《語言環境與第二語言獲得》，四川大學出版社，1999。
- [9] 付文莉、白麗梅，〈國內語言景觀研究的Cite Space分析（2005～2019）〉，《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第3期（2020）。
- [10] Landry, R. & R. Bourhis,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1997).
- [11] 杜克·戈特著，方小兵譯，〈西方語言景觀研究學術簡史〉，《語言戰略研究》，第4期（2020）。
- [12] 尚國文，〈語言景觀與語言教學：從資源到工具〉，《語言戰略研究》，第2期（2017）。
- [13] 張暉、張恒，〈教育教學視域下的語言景觀研究述評：理論、議題及啟示〉，《創新》，第4期（2021）。
- [14] 張正生，〈漢語景觀與漢語教學〉，《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

- 版)》，第3期（2024）。
- [15] 邊婷婷、晁亞若，〈韓國語言景觀中的漢字分佈及其意義表徵〉，《語言與文化研究》，第1期（2024）。
- [16] 趙學清、劉潔琳，〈澳門城市語言景觀的多模態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22）。
- [17] 張媛媛、張斌華，〈語言景觀中的澳門多語狀況〉，《語言文字應用》，第2期（2016）。

作者簡介

李麗，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華文化傳播，跨文化交際，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海外接受等。已發表學術論文五十餘篇，出版學術專著及教材數部

通訊地址：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

通訊電郵：snl@pku.edu.cn